

产经文库

干春晖 主编

外资负面清单 管理模式与中国产业 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李津津 著

《产经文库》总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的发展主要依赖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产业分工,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以促进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但这种以扩大规模为特征的外延发展方式使得我国产业结构长期处于被动的调整状态之中。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克服产业“瓶颈”和填补产业“空白”,转变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提高产业效益,但“一产不稳、二产不强、三产滞后”的困境没有根本解决。长期以来,靠低成本制造及出口、大规模开发与建设、排浪式消费等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正在发生变化,部分行业,尤其是重化工业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企业亏损不断扩大,供给侧的产业结构调整严重滞后,无法与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升级之后的需求结构相匹配,部分行业的有效供给严重不足,表现为一方面某些领域巨大的内部需求得不到满足,而另一方面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产业投资效率和效益低下,也就是说,供需之间在结构上严重不匹配,这种资源的错配严重影响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效率。近年来,中国经济开始由两位数高速增长进入到6%—7%的中高速增长阶段,而且,还有继续向下的压力,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并不仅仅是增长速度下了一个台阶,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经济内在结构的变动和增长动力的转换,为了使中国经济以中高速持续增长,新的增长动力必须向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为主转换。

中国经济要实现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需要改变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投资驱动的现状,实现增长动力多元化、均衡化的目标,深入发掘要素升级、结构优化、制度创新等经济转型的新动力,将新改革与经济转型进行耦合,从而建立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强国地位。对于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必须以动态的眼光来审视,应该从世界经济强国和大国地位的角度来探讨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路径。这需要在全面深化内部改革的同时,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开放促改革,形成新的比较优势,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提高产业的国

际竞争力。

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我国正在进入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非典型”增长阶段,经济转型升级面临着一系列的重大问题,总体上表现为“实体经济不实、虚拟经济太虚”,制度障碍不断凸显,呈现出了“最典型”转型升级的阶段性特征。我们迫切需要在这种“非典型”增长阶段、“最典型”转型升级下,成功地跨越“转型陷阱”,为此,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我们团队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显示,在通过打造中国改革开放升级版,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上,重点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转型;在加快推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通过调结构促进经济转型升级上,重点以产业结构合理化为基础,积极突破制约高级化的约束条件;在培育动态比较优势,提升我国产业竞争优势上,重点要实现我国人力资源优势向人力资本优势转变,同时加快提升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重视具有一定潜力的产业链环节与功能的培育;在充分发挥大国综合优势,通过消费需求升级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方面,重点要设计提高居民消费率的相关机制,同时要突破地方保护、贸易壁垒等制度性的障碍,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在加快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逐步成为全球价值链的主导者和治理者上,重点以领导型企业为主体,以专业化市场为载体构筑有竞争力的国家价值链,同时通过海外合作与收购实现国家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对接融合。

产业经济学科在上海财经大学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和厚实的发展基础,该学科前身为工业经济学,始于上海财经大学“文革”后的复校之初。该学科在中国产业经济学泰斗杨公朴教授的带领下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奠定了在全国的重要地位。之后,产业经济学科主要集中在产业组织和产业结构及政策两个大的研究领域,近年来,我和团队成员主要在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研究领域做了一些工作,并重点对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过程中的问题进行了研究。三年前,我们以上海市和财政部的重点学科产业经济学为学科支撑,整合校内外的研究团队、决策咨询专家,与企业 and 政府部门紧密协作,在上海市教委与上海财经大学的支持下,以原来的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为基础,组建了上海市教委重点培育的产业经济智库——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秉持“国家急需、创新发展”的理念,对接新改革、新开放背景下国家和上海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的重大需求,围绕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中的重大问题与战略性问题,进行持续跟踪研究,在学术研究与政策咨询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

研究院追踪国际产业经济学前沿发展趋势,拓展产业经济学学科研究领域,研究解决改革中的产业经济新问题,特别是从战略角度研究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问题。研究院的负责人和核心成员先后承担了大量的国家与地方研究基金课题和政府委托的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方面的课题,已经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研究方向,如“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和波动关系”、“制度环境与产业发展”、“金融市场与产业结构调整”、“构建动态比较优势”,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近年来,在国际 SSCI、国内《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高水平学术刊物发表了一批有价值的学术论文,获得了一系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决策咨询优秀成果奖项,并为国家和上海等地方政府提供了高质量的研究报告,分别获得国家和地方领导人的好评,起到了很好的决策咨询作用。为了使这些在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方面的研究成果能够及时出版,贡献于国家与上海的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我们选择部分研究成果予以出版。

我们想借此契机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合作,选择团队成员近期的部分理论研究成果,以《产经文库》系列丛书的形式出版。近期计划推出两批,第一批以学术著作和理论研究论文为主,第二批以项目研究报告为主。除了不久前已先行出版的《居民消费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研究》(王宇博士著)之外,第一批拟出版 5 部,包括《中国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结构、制度与战略》、《国际外包承接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制度环境与中国产业的动态比较优势》、《外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与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电子商务产业链治理及升级路径》。其中第一部是团队成员近年来相关经济转型升级主题研究的工作论文集,这些论文都已相续发表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中国工业经济》等期刊;第二部著作基于郑若谷博士的学位论文,这篇论文被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第三部著作由王健博士撰写,内容是从制度环境维度研究中国产业如何构建新一轮在全球竞争中的比较优势;第四部著作由李津津博士撰写,讨论了在自贸试验区实行的外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及其对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价值;第五部由正在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做博士后研究的王法涛撰写,讨论了电商产业链的治理模式和升级路径。

干春晖

2016 年 6 月

目 录

《产经文库》总序	1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1
第二节 研究意义	7
第三节 研究内容、方法及创新点	9
第四节 相关概念	13
第二章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相关理论文献综述	17
第一节 理论综述	17
第二节 相关文献综述	24
第三章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历史沿革与现状评估	30
第一节 我国的改革开放历程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 历史沿革	30
第二节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现状评估	52
第三节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国际比较	67
第四节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具体实践进展	76
第五节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改进方向	79
第四章 我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产业开放领域的实证分析	82
第一节 负面清单制定理论依据的国际比较分析	82
第二节 我国负面清单的制定	84
第三节 结论	96

第五章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与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机制路径	
研究	101
第一节 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101
第二节 政府职能的转换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系机理	104
第六章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	110
第一节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外商直接投资与各国产业结构 变迁	110
第二节 商业环境、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与外资产业溢出效应	119
第三节 技术差距、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与外资产业溢出效应	131
第七章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政府职能转化与产业结构升级	144
第一节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与各国政府职能转化	144
第二节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政府职能转化与政治关联	148
第三节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政府职能转化与寻租行为	165
第八章 总结和政策建议	181
第一节 主要结论	181
第二节 政策建议	186
第三节 本书以后研究的方向	189
附录	190
参考文献	215
后记	223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一、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得益于制度改革和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巨大制度红利和改革红利。然而,伴随着我国传统比较优势的逐渐衰减、新竞争优势的“断档”,以及前一轮改革红利与制度红利的逐渐消失,我国的经济增长正在由高速阶段向中高速阶段转变,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深化改革迎来深水区,前期政策经历消化期,在这“四期叠加”的环境下,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如何在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中高速增长阶段下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成为重塑我国在世界经济中强国地位的重要战略部署。

从国际环境上看,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严重失衡,具体表现为国际贸易的失衡、资源禀赋与消费的失衡、财富分配的失衡,全球经济增长模式面临着深刻的调整,世界上主要大国都在进行经济发展方式的调整。从我国的现实国情看,一方面,我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经济发展的制度性障碍不断凸显、劳动力等资源成本不断上升、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低附加值制成品的出口阻碍不断上升等。另一方面,我国正在进行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通过建立与国际投资贸易接轨的高规格、高标准规则,来提升政府管理水平、扩大对外开放。新形势下,如何缓解、突破经济转型升级硬约束的同时,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通过制度创新释放新一轮的改革红利与制度红利,成为当前我国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举措。

成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我国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首要举措,目的是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探索新路径、积累新经

验。从内容上看,自贸区的制度创新主要体现为“1+3+1”模式,即“投资管理创新”+“金融创新、航运创新、贸易创新”+“监管创新”。其中,投资管理制度创新成为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引擎,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引擎的核心所在。从历史上看,我国经历了四个阶段的改革开放,相应的外资准入管理模式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前三个阶段的改革开放,更多的是扩大对外开放,不断加强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引导,取消不合理的进入限制。而第四个阶段开始,我国的改革开放,不仅涉及外商准入制度的变更,也涉及政府管理职能的转变,特别是2002年开始的国务院取消多项行政审批制度,就是为了不断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中,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不仅在外商直接投资上一改过去正面清单的方式,更重要的是体现在由审批制向备案制转变所带来的政府管理模式的根本变化,要求政府从注重事前审批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因此,进一步深入研究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制定,以及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与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系机理和路径十分关键。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对外开放,即不断扩大外商直接投资的领域,取消不合理的限制,特别是不断扩大服务业开放;另一方面是政府职能的转变,不断用政府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

从产业的对外开放上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呈现迅速发展的势头,其流量增速也超过了同期全球工业产值和贸易总额的增速,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发展中最为活跃的因素之一。联合国贸发会统计数据显示,在1978—2012年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增长近36倍,而同期世界商品出口总额从5750亿美元增加到103931亿美元,增长约17倍,增速不及外商直接投资额的一半。外商直接投资越来越成为各国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关键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得益于制度改革和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巨大制度红利和改革红利,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成为实现“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动力。2011年,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流量达到1239.85亿美元,仅次于首位的美国(UNCTAD, 2012),成为世界各国、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热土。据国际咨询机构科尔尼公司发布的《2012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显示,亚洲国家仍然是全球最具投资吸引力的地区,特别是部分新兴体。而我国的外资吸引力自2002年以来,一直维持在世界前五名之列。伴

随着我国城市化步伐的加快、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带来的市场规模和容量的不断扩大,必将使我国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世界投资的黄金地区。

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行为,一方面,弥补了一段时间以来我国产业发展资金不足的缺口,同时大量涌入的资本与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结合,也显著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另一方面,通过“市场竞争效应”、“技术溢出效应”以及“人力资本效应”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提供了先进的技术、人力资本的支撑。然而,外商直接投资在推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催生了许多负面影响:第一,跨国投资行为越来越多地挤占中国的市场容量,特别是我国一些新兴行业的发展,受到外来资本的冲击较大;第二,外商投资行为大多是资源导向型为主而非市场导向型,而这种模式并不会显著地促进东道国的产业换代升级,而是加快了东道国资源的匮乏;第三,外商直接投资使中国产业的发展越来越受到全球价值链的影响,特别是不合理的外资引入,是我国产业长期处于价值链低端环节,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何趋利避害地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对于一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影响重大。

从政府职能转变上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取得快速的发展,而伴随这一过程的是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不断调整 and 变化。从总体上看,我国国民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在不断提升,市场的作用在不断增强,但政府和市场还存在“错位、缺位、越位”的问题。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的关键阶段,如何在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过程中,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成为新形势下社会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机制顺畅的新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的同时,合理定位并履行好政府职能,两者有机结合、相辅相成,这既是对过去三十多年改革经验的总结,也为今后的改革指明了方向和重点。概括来讲,就是要用政府权力“减法”换市场活力“加法”,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主要集中于宏观调控、保护产权、保障公平竞争、提供公共服务和加强社会治理等方面,为市场更好地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创造环境,而非替代市场。

我国的政府行政管理模式经历了五次重大的调整,1982年我国开始第一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次改革主要是以机构改革为主,为了适应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转变的需要,着力改变机构臃肿、层次繁多等状况,政府明确了行政、

事业、企业的界限,此次改革并没有触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政府职能并没有得到转变。1988年,我国开始第二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首次提出转变政府职能这个概念,逐步裁减专业管理部门和综合部门内设的专业机构,不断减少专业部门对企业的干预。但是这一阶段的改革,主要是调整和减少工业专业经济管理部门对企业的干预,改革的力度和面还很窄。1993年,我国开始第三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此次改革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进一步转化政府职能,简政放权,并对投资、财政、金融等管理体制进行全面的完善。同时,将一部分专业性的经济部门转化为经济或服务实体,将综合经济部门的工作重点转到宏观调控上来。1998年,我国开展改革开放以来力度最大的一次改革,在转变职能方面迈出更大步伐。特别是实行政府机关与所属的经济实体,或者直接管理的企业脱钩,同时大幅度裁并国务院组成部门,精减人员编制。2002年以来,我国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更多地强调政府的放权,期间,我国又先后开展六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共取消不合理的行政审批制度2497项,占总行政审批的69.3%。进一步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进入2013年,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成立,无疑拉开了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序幕,而此轮的改革开放,更多的是强调制度上的创新,包括投资管理体制的创新、金融制度的创新、监管制度的创新。其中负面清单为核心的投资管理体制的创新,更是体现了新常态下对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负面清单实施后,改注册制为备案制,拉开了政府由事前审批向事中事后监管的序幕,这不仅仅是减少政府干预的要求,更对政府效率、政府能力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因此,如何在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中,进一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提升政府服务经济的效率,对于我国新一轮的结构调整 and 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产业结构转型是后发国家加快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Chenery et al., 1989),一国产业结构能否转型,直接关系到国家发展的可持续性。而伴随着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外资引进,我国的产业发展逐步从政府主导向市场配置过度,同时呈现出一些趋势和问题:一是我国的工业化程度在不断的加快,工业总产值占GDP比重持续上升,这主要是由于我国长期以来重投资而轻消费的发展模式,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有所强化,要素价格的扭曲使得高能耗、低技术水平工业项目快速发展,国内外资金大量涌入工业领域,使得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陈佳贵,2010);二是我国传统具有比较

优势的产业的优势逐渐丧失,而新的比较优势“断档”。这主要由于伴随着我国劳动力、能源和原材料成本的不断上升,我国的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步衰减,而由于人力资本水平低下、创新能力不高,导致我国处于价值链高端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严重滞后。三是产业结构不合理。“一产不稳、二产不强、三产滞后”的结构性问题仍然存在,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的质量。一方面,我国的第二产业取得快速的发展,特别是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第二产业产值占比从1978年的45.4%增长到2010年的61.4%。工业占第二产业比重自1978年以来几乎均高于90%,截至2010年,按照1980年不变价计算,工业产值占的比重达到61.37%,比改革开放之初增长47.6%;另一方面,我国的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内部结构层次不齐。第三产业占比仅从1978年的21.5%增长到2010年的27.8%,而其中的高端服务业发展更为滞后。

外商直接投资以及政府职能的转变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伴随着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外资引进力度的加大,我国的产业发展面临诸多问题,产业合理化和高级化程度有待提高,同构化和过度工业化现象严重。这都表明,如何合理引进外资,通过外资的“溢出效应”来提升我国产业发展的技术层级和人力资本水平,从而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服务化和产业发展的高级化水平不断提升,成为当前我国进一步融入全球价值链,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环节中地位的关键举措。而与此同时,我国不仅面临着如何更好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迫切任务,甚至面临着如何进一步扩大外资引进规模的重要问题,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着深刻的调整,主要大国都在进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主要发达国家开始“再工业化”进程,这既是为了防止制造业的过度“空心化”,也是各国针对工业,特别是由于制造业在国内产业体系中的地位下降,影响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导致大量投资流向国外带来国内投资不足,采取的“回归”战略;另一方面,以东南亚为代表的国家,正在积极依靠本地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和市场融入全球价值链,参与国际分工,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同时,转移了发达国家对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大量资本流入。与此同时,我国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相关研究表明,我国地方政府的行政效率不高、行政性壁垒等问题,严重制约了我国产业发展绩效的提升,因此,我国政府管理职能有待进一步提升,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

二、问题提出

成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目的是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创新,来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外商直接投资管理办法,更有效地引进和管理外商直接投资。2013年,国务院颁布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总体方案通知,强调之所以要建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为了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通过新一轮的制度改革来释放制度红利。其中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探索外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等相关内容的试点实施,可以为全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积累新的经验。为此国务院批准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将原先的洋山保税港区、外高桥保税区以及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统一为上海自贸区,区域总面积达到28平方公里,区域内的成交额超过1万亿元。为全面有效推进试验区工作,通知要求上海从九大方面进行全面战略部署,其中第三大任务和措施就是“探索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借鉴国际通行规则,对外商投资试行准入前国民待遇,研究制定试验区外商投资与国民待遇等不符的‘负面清单’,改革外商投资管理模式。”2015年4月21日,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和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同年4月27日上午上海自贸区正式纳入陆家嘴金融片区、金桥开发区与张江高科技片区,至此,中国自贸区正式进入2.0时代。同时,四大自贸区共用同一张负面清单,并且条款由上海自贸区版的139条缩减至122条。

负面清单实施以前,我国的外资准入管理模式主要是正面清单的方式,产业开放的依据主要是2011年颁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1修订版),法律依据主要是“外资三法”。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主要包括鼓励类条款、限制类条款和禁止类条款。而目录中未作说明的产业领域,则原则上是允许外商直接投资的。这是一种正面清单式的管理模式,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采用这种管理模式。而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都采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该模式以负面清单的方式规定不可以做的,规定之外的即为对外资开放的领域。2013年7月举行的第5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我国同意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与美方进行投资协定实质性谈判。历经长达5年的9轮艰难谈判博弈,正式进入实质性阶段,至此,负面清单也已经成为我国外商投资管理模式不可逆转的趋势。

通过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

实现产业的对外开放,提高我国产业发展的附加值,提升我国产业发展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制定及实施将面临巨大的挑战:首先,如果不能将一些重要的新兴服务业部门列入清单,那么一个新出现的服务部门从产生之初起就门户大开,直接面临其他国家同类服务的强大竞争,造成对我国产业体系的巨大冲击。其次,负面清单制定后,开放领域的外资进入,将会对我国的经济波动产生巨大的影响。第三,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政府职能提出更高的要求,如何进一步完善政府管理水平直接关系自贸区建设的成效。因此,由正面清单向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转变,可能需要处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负面清单的文本制定问题,现有的负面清单主要是依据《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的外商投资禁止类、限制类和鼓励类中的股权限制要求类。如何制定符合新一轮改革开放要求,以及我国产业发展需要的负面清单文本,制定合理的评判标准,合理地扩大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开放领域将是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一个重大挑战。二是负面清单制定的依据、原则是什么,世界上不同国家制定负面清单的依据和原则是不同的,那我国负面清单制定的依据、原则是什么,是否有别于别国。三是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还涉及政府职能的转换,如何在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过程中,实现政府职能的合理转化,也将是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应有之义。更重要的是伴随着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实施,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机制到底是什么,也有待进一步的验证。

第二节 研究意义

本书首先分析了我国外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提出的现实背景,通过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不同阶段我国的外资准入管理模式后,阐述作为新一轮改革开放中外资准入管理模式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较以往的外资准入管理模式的区别,特别是分析了由正面清单向负面清单转化,对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性转变。基于此,深入分析外资负面清单的内涵、现状以及国际比较,指出我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在清单文本方面有待进一步改进的方向,并且,通过产业竞争力和产业安全等维度进一步论证我国负面清单产业开放的理论逻辑。最后重点探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两个重要内容,产业对外开放和政府职能转变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全国推广实施后,对于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机制和传导路径。

一、理论意义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伴随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成立而颁布实施的,目的是为了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从而向全国推广。选取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中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作为研究对象,在全面考察负面清单制定的国际经验比较和理论逻辑后,重点分析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第一,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不同于过去我国的正面清单形式的外资准入管理模式,如何确定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制定的理论依据和原则,目前还是比较缺乏的,就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书拾遗补缺的研究可以为政府政策战略的制定提供理论支持。

第二,本书重点阐述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于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机制,特别是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所包含的两个重要内容(产业对外开放和政府职能)转化入手,针对每一块内容都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阐述其对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产业发展绩效的关系。在前者的研究中,现有的研究主要是从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来探讨,并没有分析溢出效应的限制条件、传导路径。本书在探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通过产业对外开放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重点探讨经营环境,技术差距等产业溢出的关键影响因素。在后者的研究中,本书在微观层面重点引入交易成本、政治关联的要素,来刻画伴随着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推广实施,带来的政府职能转化如何影响产业发展的绩效,进而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些也为负面清单在今后的研究中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实践意义

本书选取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中的外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作为研究内容, also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第一,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实施的都是正面清单管理模式,而伴随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成立,我国逐步由正面清单管理模式向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转变,而这种转变将会对我国产业发展带来难以预测的冲击。本书在归纳了国际上负面清单制定的经验教训后,重点从产业竞争力和产业安全的角度阐述负面清单文本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第二,更重要的是研究我国在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后,对于我国产业结

构转型升级的作用机制和传导路径是什么。本书通过相关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了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实施后,产业对外开放和政府职能转变对于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具体影响机制。并且,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哪些因素制约了两个方面作用的正常发挥,这对于我国如何更好地发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积极作用提供了现实的实践指导。

第三节 研究内容、方法及创新点

一、研究内容和框架

(一) 研究内容

本书除导论外,共分七个章节:

导论部分,阐述了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以及本书研究内容的框架及方法,并对文章可能的创新点给予介绍。

第一章是关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理论基础及相关研究综述。主要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政府管制理论和产业竞争力理论三个角度来探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理论基础。而涉及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相关文献研究主要是对国际直接投资与产业开放、政府管制与产业开放以及现有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研究。通过本章内容,建立本书的逻辑起点和研究框架。

第二章是关于我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历史沿革与现状评估。第一节阐述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历史沿革,重点分析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以及历次改革开放中的外资准入管理模式的演变。第二节重点探讨我国现有负面清单的现状评估,主要从产业的层面进行负面清单与过去的正面清单的比较分析,负面清单不同版本之间的比较分析。第三节则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法理基础、内容架构、投资口径和事中事后监管四个方面进行国际比较,从而为我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通过第四节探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具体实践后,提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进一步改进的方向。

第三章重点分析我国负面清单制定的理论依据。首先通过第一节内容,重点分析了世界上主要国家制定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依据和原则,从而提出我国制定负面清单的两大重要依据。第二节和第三节则分别从产业竞争力和产业安全的角度去阐述我国负面清单制定的现状和未来进一步开放的方向。

第四章分析我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机制和传导路径。深入分析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所包含的产业对外开放和政府职能转变对于我国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推动作用,分别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详细阐述了其具体的作用机理。从产业对外开放上看,宏观层面提升我国资源配置效率、改善我国的消费结构;微观层面则通过产业溢出效应,提升我国产业的发展绩效。从政府职能转化上看,宏观层面提升我国资源配置效率、加快我国产业创新的步伐;微观层面减少企业的交易成本以及政治关联带来的资源的扭曲。

第五章从企业微观层面对产业对外开放影响产业升级的机制进行实证检验。在肯定产业对外开放通过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促进本土企业绩效提升的前提下,进一步分析影响这些溢出效应的关键要素,特别是从企业的经营环境和技术差距两个维度,阐述其对于产业溢出效应的阻碍作用。这为如何更好地推进产业对外开放促进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也为进一步改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提供方向。

第六章从企业微观层面对政府职能转化影响产业升级的机制进行实证检验。本节发现政府职能转化能够有效地减少企业的交易成本,并且减少行业内部的资源配置扭曲,从而推动企业绩效的提升,促进产业整体的转型升级。

第七章是全书的主要结论总结。总结主要研究结论,并且进一步分析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改进的方向,以及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下,我国产业发展战略的选择问题。最后,介绍以后的研究方向。

(二) 研究框架

本书对以上研究内容进行组织归纳梳理,按照下面的结构图来展开全书的研究。首先是提出问题,接下来是进行理论综述,并构建相关理论来探讨我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未来改进的方向,然后通过实证检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我国产业升级的实际情况和影响因素,最后是提出政策建议。

二、研究方法

通过理论论证与实证分析,在产业升级的分析框架下,注重产业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等学科的联系与融合,探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产业升级影响的机制,并对具体的影响因素进行微观层次的实证检验。通过对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产业对外开放、政府职能转化和产业结构等大量研究文献的收集和整理,进一步厘清各个因素之间的关系,为本书的理论框架和逻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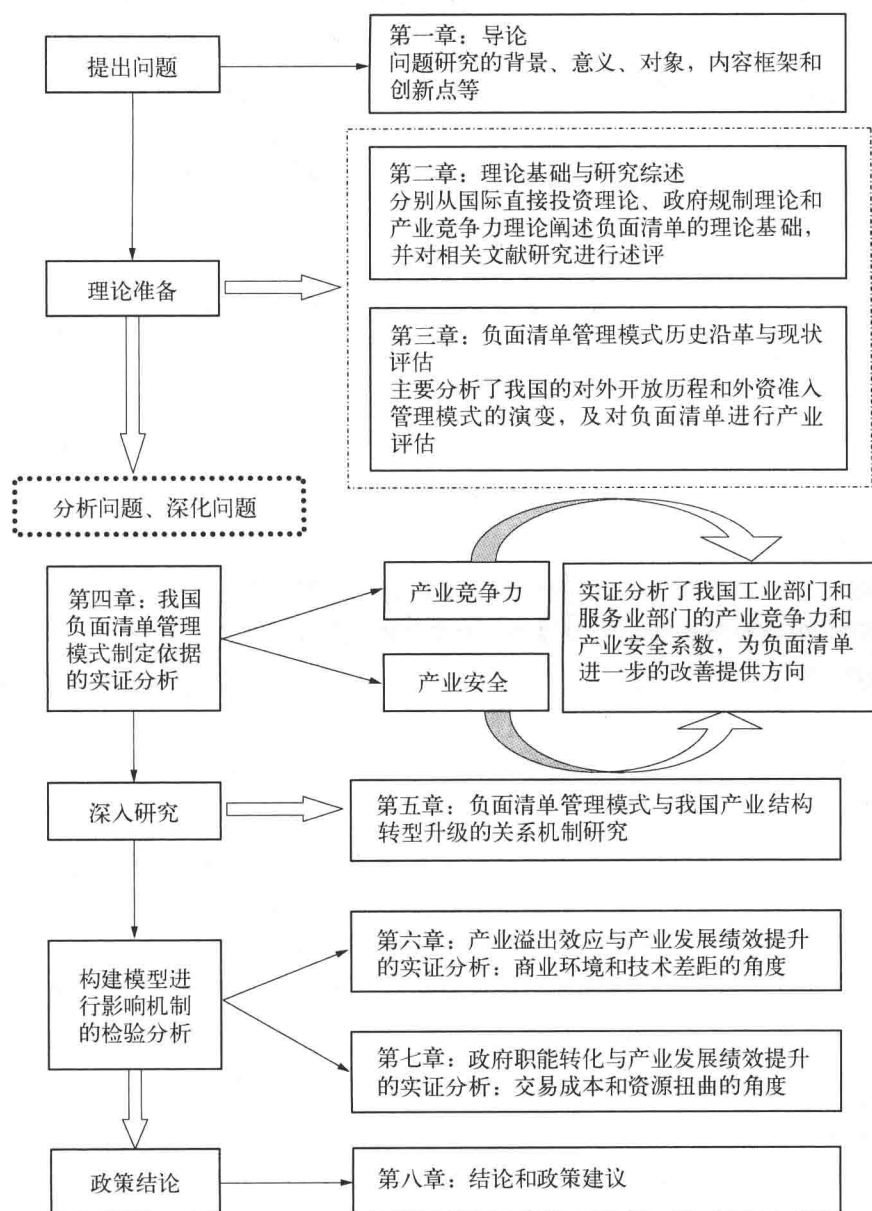


图1 研究框架